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大众的反叛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
刘训练 佟德志◆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大众的反叛

[西班牙]奥尔特加·加赛特 ◆ 著
刘训练 佟德志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的反叛 / (西)加塞特著;刘训练,佟德志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74-4

I. ①大…

II. ①加… ②刘… ③佟…

III. ①政治哲学—西方国家—现代

IV. ①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57 号

大众的反叛

著者:(西)奥尔特加·加塞特 译者:刘训练 佟德志

责任编辑:崔文辉 郭威 封面设计:张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印张:13.75 字数:189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74-4

版次:2011年1月第2版 印次: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范围内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大众的反叛与欧洲的前途

——中译者引言

一、大众时代的知识贵族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 (Jose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 无疑是 20 世纪西方思想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 然而, 他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却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1]

奥尔特加 1883 年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奥尔特加的父亲是一位小说家和记者, 他母亲的家族则掌握着西班牙当时一家著名的自由派报纸, 所以奥尔特加说自己是“出生在一架印刷机上”。1904 年在马德里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 奥尔特加负笈德国, 于 1905 至 1907 年间在柏林、莱比锡和马尔堡等地求学。回国以后一直从事教育文化工作, 1910 年起担任马德里大学形而上学教授, 直到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

奥尔特加不是一个象牙塔内的学者, 而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 可以说他是集思想家、教育家、出版家、作家、演说家以及政治活动家诸多头衔于一身。1914 年他与友人创建了西班牙政治教育联合会, 1915 年他创办了《西班牙》杂志, 1923 年至 1936 年他创办并主编了著名的《西方评论》月刊。此外, 他还与友人合办了享誉全球的《太阳报》以及西班牙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爱斯帕莎-卡培 (Espasa-Calpe) 出版公司。

奥尔特加生活的时代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为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年

代，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其他的现代哲学家几乎很少能够像奥尔特加在 20 世纪 30 年代西班牙共和国时期那样，发挥如此深入人心的影响和主导作用，或许一个都没有”。^[2] 在里维拉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1923 年—1930 年），奥尔特加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反对君主制和独裁统治，为此他曾一度辞去教职以示抗议。1931 年，他和其他共和派知识分子一道创建了“共和国服务协会”。在里维拉倒台和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退位以后，奥尔特加作为莱昂省的代表当选第二共和国的立宪议会议员，并在马德里市政府任职。但奥尔特加很快就对现实政治感到厌倦，于第二年退出了政界。1936 年到 1939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尔特加对左右两派人士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坚决反对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把西班牙作为其政治实验地。佛朗哥掌权后，他不愿意在独裁统治下苟安，于是自动流亡海外，赴阿根廷、法国、葡萄牙等地游历讲学。二战结束以后，他曾两次回访祖国，但直到 1948 年才归国定居，其后他创建了人文主义研究会。在最后的十年生涯中，他曾多次赴欧美等地讲学，并由此获得了崇高的声誉。1955 年，奥尔特加在马德里去世。

奥尔特加是 20 世纪非常罕见的一个“知识贵族”，他的著作不但数量惊人，而且涉猎范围极为广泛，哲学、文艺评论、政治、历史、心理学乃至教育等等无一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他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堂吉珂德沉思录》、《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时代的主题》、《艺术的非人性化》、《关于小说的笔记》、《大众的反叛》、《大学的使命》、《历史是一个体系》、《走向一种历史哲学》、《人与民族》、《什么是哲学？》、《哲学的起源》、《人类与危机》、《现象学与艺术》、《对世界史的一种解释》以及《历史理性》等。^[3]

作为哲学家，奥尔特加被视为 17 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与另一位著名思想家乌纳穆诺一时瑜亮，堪称西班牙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双子座，^[4] 加缪更誉之为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虽然人们一般都把奥尔特加的哲学看作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一支，但事实上他的哲学思想极为复杂：早年他曾受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接受客观主义（Ob-

jectivism)；其后又转向透视主义 (Perspectivism)；最后则形成所谓理性—生命主义哲学 (Ratio-Vitalism)。^[5] 而格雷厄姆在其最近对奥尔特加的卓越研究中，则以“后现代主义”和“实用主义”来概括他的思想体系。^[6] 同样，对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人们也是各执一词：伯恩斯坦认为他的思想属于“自由保守主义”；^[7] 约翰·格雷把他与韦伯、帕累托等人一道称为“绝望的自由主义者”；^[8] 萨托利说他“主张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9] 而哈耶克、艾因·兰德等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对他更是推崇备至。不过，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更多是一位保守主义者的形象，并作为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而知名。

二、大众批判与精英主义情结

《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 20 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 18 世纪，《资本论》之于 19 世纪。那么，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奥尔特加所说的“大众”到底指什么人。奥尔特加认为社会是由少数精英和大众所构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少数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大众则是指没有特殊资质的个人之集合体”。^[10] 正如作者本人以及许多评论者所一再指出的，不能把这里的大众简单地理解为劳动阶级。奥尔特加关于大众与精英的区分并不是社会阶级的划分，而是两类人的划分，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中都存在着大众与精英。^[11]

奥尔特加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类型的人：

一种人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的责任和使命；另一种人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在他们看来，生活总是处在既定的状态之中，没有必要做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

们就像水流中漂动的浮标，游移不定，随遇而安。

在以往的时代，大众“很清楚自己在一个有序的、动态的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就是各安其位”。然而，在当代欧洲的公共生活中，大众却开始掌握最高的社会权力。奥尔特加指出，就“大众”一词的涵义而言，大众既不应该亦无能力把握他们自己的个人生活，更不用说统治整个社会了。“因此，这一崭新的现象实际上就意味着欧洲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将导致生灵涂炭，国运衰微，乃至文明没落”。这就是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的反叛”。

奥尔特加认为这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现实，它的野蛮特征一览无余：“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由此，他惊呼：欧洲正在目睹一场“野蛮人的垂直入侵”，如果这一类人继续成为主宰，那么不出 30 年，欧洲将会退化到野蛮人的境地！

奥尔特加随即又指出，“政治活动虽然是公共生活中最有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但它不过是其他更隐蔽、更难以捉摸的因素之结果罢了”。因此，大众在政治上的不服从源自于一种更深刻、更具决定性的智力上的不驯服，也就是说，大众的反叛根源于普通民众“心灵的闭塞”。

在奥尔特加看来，大众的心理存在两个基本特性：一方面是他们生命欲望的自由膨胀，亦即个性自由的伸张；另一方面，他们却对使之生活得以安闲舒适的造福者丝毫不存感激之情。由此，奥尔特加把大众比喻为“被宠坏了的孩子”，大众与宠坏的孩子之间的心理症状是相似的：

世界对他反复无常的要求没有一点限制，尽量予以满足；并给他这样的印象：他可以任意而为，无拘无束，不知道义务为何物。……由于所有外在的压力、限制都被取消，任何可能的冲突都不复存在，于是他竟然开始相信自己是唯一存在的，并习惯于

惟我独尊，而不考虑、顾及他人，特别是不相信别人比自己优秀。

那么，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奥尔特加断言：力图领导欧洲当代公共生活的“大众”正是 19 世纪的三项原则所培育和造就的，那就是：自由民主政体、科学实验和工业制度，而后两项原则可以合并为一个词：技术。19 世纪给生活秩序带来的组织上的完美，使得大众受益匪浅，但他们却把它视为一种自然系统，而不是一种组织系统。因此，大众暴露出来的心智状态是极其荒谬的：

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生活的安逸与舒适，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个兴趣。因为他们无法透过文明所带来的成果，洞悉其背后隐藏的发明创造与社会结构之奇迹，而这些奇迹需要努力和深谋远虑来维持。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只限于对文明成果不容分说的攫取，就好象这是他们的自然权利一样。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大众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奥尔特加相信技术与科学是互为表里的：“当科学不再关注其自身的纯粹状态时，它将不复存在；而除非人们对于文化之一般原则继续保持热情，否则这种关注也不会持久。一旦对纯粹科学的热情走向死寂——目前的情况似乎正是如此——那么技术不久也将寿终正寝，即使它还能苟延残喘一阵子，所依靠也仅仅是文化动力的惯性。我们与技术上的需求同生共存，但并不依赖它们而生存。”也就是说，出于实用目的对科技产生的兴趣，非但不能保证科技成果的进步与维持，反倒可能使之倒退：

我对此种情况异常惊讶，那就是当我们说到技术时，竟然忘记了技术的关键内核是纯粹科学，而技术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和纯粹科学得以繁荣兴盛的条件是水乳交融的。我们有没有认真考

虑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保证真正的科学人得以继续存在，人类的心灵与大脑需要具备哪些前提条件呢？难道我们真的相信只要有金钱，就会有科学？

更让奥尔特加感到痛心疾首的是，在科技人员自己身上竟然也暴露出对待科学弃之如履的冷漠态度，这使他断言：“当前的科技人员正是大众人之原型”。在现代科技分工中出现的专家，把自己限制在日渐狭小的知识范围之内，结果导致他们与科学的其他分支以及对宇宙的完整解释逐渐失去了联系，“而惟一能堪称科学、文化与欧洲文明的恰恰就是对宇宙的完整解释”。

众所周知，奥尔特加并不是“大众时代”的第一个预言者与批评者，也不是精英主义最著名的倡导者：在他之前有卡莱尔的英雄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帕累托和莫斯卡的精英理论、勒旁的群众心理学说；在他之后则有曼海姆、熊彼特、阿伦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社会的剖析与批判等等。但是，奥尔特加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众多保守主义人士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危机”的诊断何以显得如此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呢？这恐怕与他的剖析在很大程度上较早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困境有关。

奥尔特加写道：

这是一个深奥的、可畏的、无穷无尽的、无法预测的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论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现代文化的信仰是一种让人抑郁的信仰，它意味着明天与今天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进步只是沿着我们脚下的同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条道路毋宁是一座伸缩自如的牢狱，它可以延伸拓展，但绝不指望它能让你获得自由。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过去与现代的

豁然断裂这一无法挽回的事实，它引发了或多或少有些暧昧的怀疑心态，这一怀疑心态给当代生活带来了不安：

我们感到自己突然被遗弃在这个星球上，茫然无助；逝去的人不但在形体上离我们而去，而且在精神上也杳然无迹，他们不再给我们任何帮助；传统精神的鲁殿灵光也已消失殆尽，残留的规范、模式、标准对我们而言已经全然无用；失去了历史的助力与合作，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无论是艺术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都必须独自解决；现代人孤零零地立于大地之上，再也没有充满生机的幽灵伴随其左右。

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中：人们确信自己拥有巨大无比的创造力，却又不知道应该创造些什么；他可以主宰一切事物，却又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在自己的充盈富足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过去相比，它掌握了更多的手段、知识和技术，但结果却是重蹈以往最不幸的时代之覆辙：今天的世界依然缺乏根基，漂泊不定。

奥尔特加对自己的精英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毫不隐晦：“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并且坚持这一观点的信念与日俱增：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人类社会按其本质来说，就是贵族制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只有当它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才真正成其为一个社会；当它不是贵族制的时候，它根本就算不上一个社会。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社会，而不是国家。”他认为“贵族”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字眼，在日常语言中遭到了曲解和滥用。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贵族”仅仅意味着世袭的“高贵血统”，这样它就沦为与共同权利相差无几的事物，成了一种静止的、消极的身份与资格，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可以获得与转移。但是，就严格的意义而言，“贵族”一词的语源本来是动态的：“在我的心目中，贵族就等同于一种不懈努力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目标就是不断地超越自我，并把它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



尽管奥尔特加费尽心思，对“贵族”做出如此繁复的限定与说明；可是，现实中贵族头衔只能通过世袭来传承这一事实还是无情地否定了他苦心孤诣的辩护。当然，奥尔特加对血统贵族也做了严厉的批判，以致于“贵族世家子弟”成了“大众”一个极具贬义的譬喻。才能与德行是无法遗传的这一简单事实不知让多少精英主义的思想家头疼不已，柏拉图“高贵谎言”的善意虚构、儒家“内圣外王”的崇高理想无一不在这个问题上露出破绽。或许人类真的走不出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所说“民众缺少才智，伟人没有心肠”的困境？

总的说来，奥尔特加对“大众”以及大众社会的批判机智、敏锐而不失警醒、深刻，但对于如何培养精英、如何实现精英的循环等问题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不过，对一个文化批评家提出社会科学家的要求似乎有些苛刻了，其实就是社会学家面对精英理论中的传统难题又能解决多少呢？^[12]

三、绝望的自由主义

同托克维尔、密尔一样，奥尔特加对正在崛起的“大众民主”可能导致的“多数人的暴政”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

奥尔特加指出：

最近发生的政治变革全然意味着大众对政治生活的支配。传统的民主政治由于自由主义和对法律的习惯性遵从这两味药剂的作用而得到缓解，由于这些原则的存在，个人把自己限制在严格的纪律范围之内。少数人能够在自由主义原则与法治的蔽护之下行动自如，民主与法律——法律之下的共同生活——的含义是一致的。然而，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场“超级民主”的胜利，在这种民主当中，大众无视一切法律，直接采取行动，借助物质上的力量把自己的欲望和喜好强加给社会。

奥尔特加在字里行间流露了他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推崇与辩护。他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形式中，最能体现人类追求共同生活之崇高意愿与努力的就是自由民主政体：

19世纪的自由主义是这样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原则：在它看来，公共政治权威尽管是强有力的，但它必须进行自我限制，甚至准备以牺牲自己为代价在它所统治的国家中为如下一些人留有空间，即那些在想法或感觉上与强者，也就是与大多数人不一致的人。在今天很值得我们追忆起，自由主义是宽容的最高形式；它是多数承认少数的权利，因此，它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曾回响过的最崇高的呼声。它宣告了一种与敌人——哪怕是孱弱的敌人——共存的决心。认为人类应该达到如此崇高、如此精致，但又如此自相矛盾、如此有悖自然的境界，着实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同一群人似乎又急欲除之而后快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一项过于错综复杂，因而难以在地球上扎根的原则。

在奥尔特加看来，以科技知识为基础的自由民主政体是迄今为止最高级的公共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或许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最好的，但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好的公共生活方式却必须保留这两条原则——自由民主政体和科技知识——的本质。因此，退回到19世纪之前的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无异于自取灭亡。

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尔特加将国家视为最大的危险。他感叹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台庞大的机器，这台机器以其非凡的方式在运转着，其精确无比且数量惊人的手段所带来的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一旦当国家在社会中拔地而

起，只消轻轻一摁按钮，它就可以启动无数操作杠杆，并以它们势不可挡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部位。

更加糟糕的是，当国家的公共生活出现困难、冲突和危机时，大众就会倾向于求助国家的即刻干预，凭借其巨大无比、不可抗拒的手段直接加以解决。

因此，奥尔特加指出，“当前威胁文明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这就等于说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13]本来，人们为了使整个社会可以运转得更好而建立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但是，如今国家却盘踞于社会之上，反而使社会不得不开始为国家而存在。

在第二次大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自由主义在欧洲面临着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严峻挑战，对此，奥尔特加奋起捍卫自由主义。

奥尔特加承认，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各种批评都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自由主义依旧颠扑不破，此种真理既不是理论上的、科学上的，也不是智识上的，而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更加具有决定性的真理，即“命运的真理”。同样，19世纪的自由主义必须被超越，但这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之类宣称自己是反自由主义的运动所能做到的。

奥尔特加恰恰是对自由主义的这种爱之切，反而使他对这一意识形态的前途忧之深。奥尔特加不无悲观预言道：“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义，为了避免存在的空虚，当代的欧洲人很有可能抑制住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异议而接受它的指引，共产主义信仰的吸引力不在于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在于它所激发的行动的热忱。”

四、大众民族与欧洲合众国

《大众的反叛》全书分为两大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